

# 알타이 학보

제 15 호

2005년 6월

## 목 차

허저어의 [+설정성] 마찰음과 파찰음의 음성 실현 양상 ..... 고동호 · 김주원	1
满通古斯諸語一百年 (20世纪) 研究 ..... 朝克	15
To the Problem of Postpositions in Udihe ..... Anna Trofimova	27
清代玺印满文篆字失误举隅 ..... 黃錫惠	41
《捷解蒙語》와 滿洲語 資料의 關係 ..... 松岡 雄太	55
현대 몽골어 동식물명의 민속학적 연구 ..... 박환영	71
Orkhon (Runic) Script Monuments In Mongolia ..... Luvsandorj Bold	87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the	
<i>Biography of Zaya Pandita</i> ..... Junko Miyawaki-Okada	113
Saghang Erke Sechen Khong Tayiji and his	
<i>Erdeni-yin Tobchi</i> in the Light of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Ch'ing Supremacy ..... Hidehiro Okada	129
A Government Phonology View of	
Harmony in Karaïm ..... Ann Denwood	141
중앙아시아의 둉간어와 小兒錦의 언어 ..... 菅野 裕臣	169
Case marking strategies in spatial relations ..... Natalya Koshkaryova, Anna Gerasimova	193
획보 ..... 229	

한국 알타이 학회

# ALTAI HAKPO

## JOURNAL OF THE ALTAIC SOCIETY OF KOREA

---

No. 15

June 2005

---

### CONTENTS

Aspects of phonetic realizations of [+coronal]	
fricatives and affricates in Hezhe .....	KO Dongho & KIM Juwon ... 1
A Hundred Years Research on Tungus Studies .....	CHAOKE, D. O. ... 15
To the Problem of Postpositions in Udihe .....	TROFIMOVA Anna ... 27
Several Examples of Errors Found in Manchu	
Zhuan Characters in Emperors' Seals of Qing Dynasty ....	HUANG Xihui ... 41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i>Ch'ophae Mongō</i> (捷解蒙語)	
and Manchu Literatures .....	MATSUOKA, Yuta ... 55
A Folkloric Study on Terms concerning Animals	
and Plants in Contemporary Mongolian .....	PARK Hwan-Young ... 71
Orkhon (Runic) Script Monuments In Mongolia .....	Luvsandorj BOLD ... 87
Historical Importance of the	
<i>Biography of Zaya Pandita</i> .....	MIYAWAKI-OKADA, Junko ...113
Saghang Erke Sechen Khong Tayiji and his <i>Erdeni-yin Tobchi</i> in the Light	
of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Ch'ing Supremacy .....	OKADA, Hidehiro ...129
A Government Phonology View of Harmony in Karaim .....	DENWOOD, Ann ...141
The Dunganese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language of	
'Xiaoerjin' (小兒錦) .....	KANNO, Hiroomi ...169
Case marking strategies in spatial relations	
.....	KOSHKARYOVA, Natalya and Anna GERASIMOVA ...193
Miscellanea .....	229

Published by

THE ALTAIC SOCIETY OF KOREA

Address: c/o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EOUL 151-745, KOREA

# 清代玺印满文篆字失误举隅 \*

黄 锡 惠\*\* (中国 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

**HUANG Xihui. (2005). Several Examples of Errors Found in Manchu Zhuan Characters in Emperors' Seals of Qing Dynasty. *Altai Hakpo* 15: 41-54. The Altaic Society of Korea.**

Among the 32 styles of Manchu Zhuan Characters provided in the 13th Year of Qian long, 10 of them were used in the Emperors' Seals which initiated a writing system both full of ethnic specialty and rich in number written side by side with Chinese Zhuan characters. This paper is the first one to research into the spelling errors in emperors' seals of Qing Dynasty, and points out in detail the errors in seals for emperors' wives, concubines and officials.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make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haracters.

**Key words:** Emperors' Seals of Qing Dynasty, Zhuan Character in Manchu writing, application, error

在中国诸多的少数民族中，创制自己民族文字的本来就十分有限，而在民族文字基础上又创造篆书者更是为数甚微。满族可以说是乃中的佼佼者——其不独创制了满文篆书一体，而且全面效仿汉文篆书三十二体，对应创造了满文篆书三十二体，从而将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篆字文化成果的实践推向极致，蔚成我国民族文字史的奇观，书写了中华文明史上的瑰丽篇章。

众所周知，老满文始创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新满文改革于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sup>1</sup>(一说三月<sup>2</sup>)。然而满文篆字始于何时历史文献却付诸阙如。根据笔

\* 本文引用的满文玺印钤本，除公开发表者外，悉为笔者到北京、内蒙古、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院、馆查阅收集。此外，尚得到各界朋友大力慷慨的馈赠。谨于此对给予帮助支持的新老朋友表示诚挚的谢忱！

\*\* (1944—)，男(满族)，辽宁盖州人，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满语语音学、地名学、满族文字学、满族语言史及满汉语言关系史等研究。

者目前所见满文篆字印文资料，其最早者为太宗时代的 **汗之宝** (满文楷书作 **han i boo bai**)，“汗之宝”，或别译“皇帝之宝”，见图一。载《明清帝后宝玺》，该玺篆字为新满文，时间上要早于八月初八日六部印的颁用，<sup>4)</sup>由此推知满文篆字创制的时间当在天聪六年正月十七日(或三月初一日)至八月初八日这半年左右的期间内。

满文篆字创制的初衷乃应玺印之需要。太祖最初因袭汉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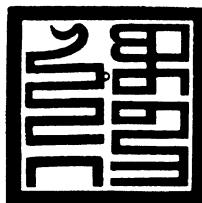
方12厘米

图二 天命金国汗之印

制汗玺，所用之字非为汉文而系新创未久的老满文，开后金用印之先河。目前所见入关前最早的满文印见诸信牌上的老满文 **abkai fulingga aisin guruni han i doron**。“天命金国汗之印”，或可译为“天命金国皇帝之宝”，见图二。载《辽海印信图录》，观其文字，皆回鹘蒙古文风格之老满文楷书，字体与通名用字(“印”而非“宝”)都同政权初建的朴素意识相适应。清太宗继位之后，易满文楷字而为满文篆字，而且于汗玺中改 **abkai doron** (“印”)为 **汗之宝** (乃汉语“宝贝”之音译，即“宝”)，则是向汉族玺印制度传统进一步靠拢的必然结果，今天遗留下来自太宗时代的玺印钤本悉为纯满文篆字应当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关于入关前的后金时代的早期满文篆字研究，笔者将另有专文布露，于此不赘)。顺治元年(1644年)清入主中原，为了适应对汉族的统治，玺印一改关外时期的纯民族文而为满汉文字合璧形式，汉字沿袭了明代玺印中的玉箸篆、九叠篆、柳叶篆等，满文采用楷书形式，正式形成我国官印民族文与汉文的合璧制度。只不过由于汉文用的是汉族传统的篆书，而满文则用的是楷书，在合璧字体上显得不够统一与谐调。

满文篆字完善、详备于文治武功皆堪称鼎盛的乾隆时代。乾隆十三年(1748年)，在高宗的直接参与指授下，不仅推进了满文篆字的完善，而且借鉴汉族古文字文化成果，进一步相应制成了满文篆书三十二体，从而形成了清代满文篆字丰姿多彩的绚烂局面，凸起中国文字发展史的又一兀峰。

有清一代满文篆字主要应用于玺印和碑额(关于清代碑额满文篆字的应用研究，笔者



青玉，方三寸九分，  
厚一寸，交龙纽  
高二寸一分

图一 汗之宝

**abkai fulingga aisin guruni han i doron**。“天命金国汗之印”，或可译为“天命金国皇帝之宝”，见图二。载《辽海印信图录》，观其文字，皆回鹘蒙古文风格之老满文楷书，字体与通名用字(“印”而非“宝”)都同政权初建的朴素意识相适应。清太宗继位之后，易满文楷字而为满文篆字，而且于汗玺中改 **abkai doron** (“印”)为 **汗之宝** (乃汉语“宝贝”之音译，即“宝”)，则是向汉族玺印制度传统进一步靠拢的必然结果，今天遗留下来自太宗时代的玺印钤本悉为纯满文篆字应当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关于入关前的后金时代的早期满文篆字研究，笔者将另有专文布露，于此不赘)。顺治元年(1644年)清入主中原，为了适应对汉族的统治，玺印一改关外时期的纯民族文而为满汉文字合璧形式，汉字沿袭了明代玺印中的玉箸篆、九叠篆、柳叶篆等，满文采用楷书形式，正式形成我国官印民族文与汉文的合璧制度。只不过由于汉文用的是汉族传统的篆书，而满文则用的是楷书，在合璧字体上显得不够统一与谐调。

1) 见《满文老档》下册，1196页。

2) 分别《清太宗实录》卷11；《清史稿》卷228《达海传》。

3) 为便于参考引用，本文于满文后对应列出国际通用的罗马转写字。

4) 《清太宗实录》卷12载：“癸酉，工部大臣以六部衙门工竣，奏闻，上往视。上又命六部贝勒于初入署时，率本部大臣赴关领印；各部事宜，皆用印以行。……于是领六部银印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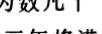
亦将另有专文), 尤其是玺印方面。从皇帝到后妃、太子、诸王、藩国、内外文武大臣、宗教领袖等, 皆分等级别尊卑, 次第以同体满汉文玉箸篆、芝英篆、尚方大篆(即九叠篆)、尚方小篆(即小篆)、钟鼎篆、垂露篆、柳叶篆、殳篆、悬针篆、转宿篆等十种合璧入印, 从而既弥补了顺治时代合璧满汉文书体不谐的美中不足, 又创造了中国玺印制度史上官印篆体种类应用最多的记录(有关清代玺印方面满文篆字的应用, 请详笔者《不断完善 广泛应用—清代满文篆字应用情况的再调研》一文)。

民族文字进入玺印与汉字合璧并成为一种制度, 是满族的独特发明创造, 是满汉文化交流融合的体现, 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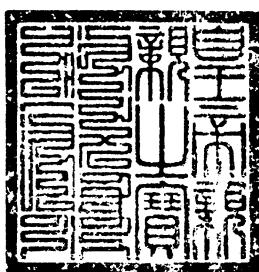
满文是以“牙”为基础笔画的, 字母的区别主要在于牙的多少与圈点及字辩等附加成分的有无与位置变化。因此, 书写中要严格按照拼写法的规范进行, 否则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信息的错乱歧误。由于满文篆书是严格按照满文楷书形体对应创制的, 只是为了字体的方正进行了个别字形的调整变化, 拼写中词线右移兼其开放式词线位置变化频仍, 形成一整套繁杂的拼写方法, 并且不同字体篆字除了体形态标识的差异之外在拼写方法的处理上也不尽雷同, 因此比之满文楷书无疑要复杂冗繁得多, 所以对于一般只识满文楷书而不懂满文篆字者来说颇类似只识汉文楷书而不懂汉文篆字者一样看去不啻“天书”。因之即便是在清代, 真正识满文篆字者也非多多, 故而满文篆字这一新生事物在应用中避免不了拼写错误或异体相混之处。

从乾隆十三年至宣统逊位, 满文篆字于清代合璧玺印中通用达174年之久(迟至宣统二年九月满汉文篆字合璧官印仍在铸制颁发, 个别地方的印信甚至在民国初年仍在使用, 民国十一年仍有皇贵太妃宝镌制事), 出于各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篆稿、审稿人的篆法不纯熟或偶然失误, 制模、铸造时恐怕也有走样的时候, 此外铸成后的稽核把关者疏于职守亦难辞其咎), 其中的失误每每可见, 乾隆时代即已现端倪, 以降诸帝亦步其踪迹, 尤以光绪朝为烈。兹举隅如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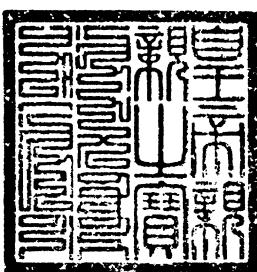
玺印中, 与皇帝的“天子”地位相应, 在行使权力中作为信物的御宝规格最高, 也最为神圣, 可谓“至尊宝”。即便如此, 仍难免舛误。

乾隆十一年厘正交泰殿藏宝时将三十九宝钦定为二十五宝, 作为传国之玺, 另将其文或复见及国初行用者为数凡十”赍送祖宗发祥地尊藏, 即“盛京十宝”。二十五宝中后二十一宝则于乾隆十三年将满文楷字改制成与汉文同体的玉箸篆字。在改制后的合璧篆字宝玺中, 有一方“皇帝亲亲之宝”(见图三。载《交泰殿宝谱》)存在着一处明显的满文拼写失误, 从其问世积今两个半世纪以来尚无人发现指出。在这方御玺中, 动词“亲”  niyamalara (本文列举的规范满文篆字悉以乾隆十三年刊行的《御制盛京赋》相应篆体为准)的  -la- 音节之  -l- 辅音被错归于其下的  -a- 元音上, 即  上撇的“字辩”下移一位, 使这个词变成满文中所没有的  niyamanlra, 造成了满文拼写法中所不允许的  -nla- 三

辅音并列的形式。此宝的正确拼写当如笔者所恢复的图四。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民国二十一年故宫博物院印行的《清代宝玺》明信片中，该印的摹写本(?)不但未能更正此一失误，反而增添了新的错误，即将属格助词 [č i] 之左下垂折笔和下面 **ニヤマン** niyaman 词中的首辅音 ɿ · n- 的点以及其下与横笔断开的 ɿ · -i- 元音左下垂折笔、ɿ · -y- 辅音的上折笔统统连为一体，ɿ 的底部并与词尾 ɿ · -n 的底画相连，同时尾辅音 ɿ · -n 的回卷末笔顶端上折与上画连在一起，使这两个字写成 **ニヤヌ**，变得更加面目皆非(见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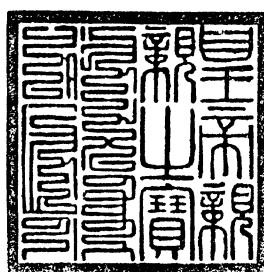


白玉，方二寸二分，  
厚一寸一分，交龙纽  
高一寸二分



图三 皇帝亲亲之宝

图四 皇帝亲亲之宝



图五 皇帝亲亲之宝

后妃的地位也是尊崇的，其宝印亦非寻常可比。在宣统逊位后的民国十一年制的“端康皇贵太妃之宝”<sup>5)</sup>(见图六。载《故宫信片第五集清代宝玺》)中，“端” **タブ** tab 于元音 ɿ · -a- 下增牙而成为 **タバ** tanb，这个词在满语文中是不存在的。“太妃” **タバ** **タイ** taipei 这个词的首音节 **タバ** **タイ** tai- 之 ɿ · -a- 下增牙而成为满文拼写法中所不允许的 **タバ** **アイ** ta'ai- 形式，从而将此字写成满文中所没有的 **タバ** **アイ** ta'aifei，对比同集内的“恭慈康豫安成皇太后之宝”(见图七)“太后”之首字，可以清楚看出这一失误。这两个词都是 ɿ · t- 在作为首辅音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可以分析出系篆写者不熟悉满文 ɿ · t- 的变形写法，由于不明其下的“牙”已经变形手法折移至右方且牙尖改朝向上(其篆字来源请参见拙作《满文小篆研究(上)》第二部分“字母形态结构分析”第四点“形体变化”)，以致于拼写时为了表现出“牙”而衍讹。同时，第二个词“康” **ケン** **ヘル** nelhe 尾音节的辅音没有按照变形法规范书写，

5) 关于端康皇贵太妃晋封之时间，《清史稿》没有具体记载，仅言：“端康皇贵妃……宣统初尊为兼祧皇考瑾贵妃，逊位后进尊封。”(见卷214《后妃传》)这里是根据溥仪《我的前半生》第133页的记载：“在这个礼仪之前，即十一月十日……晋封四个太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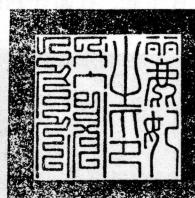
而写成首笔向下折垂如词首的 [v, j], 使 f, ð, -h- 变成了 t, 且曲线结构下的尾元音 ɿ, ɻ - e 的写法完全脱离了满文篆字的规范成为三十二体满文篆字篆法中所没有的 ɿ, 辅音的圈也没有齐底而使这个字写成了 ɿ。第三个词“皇” ɿɿɿ hūang 被写成 ɿɿɿ, 首辅音顶端中间未断, 尾复辅音的最后一个字母也被写成诸体满文篆字所无者。



金, 方三寸八分,  
厚一寸一分, 蹲龙纽  
高二寸五分



青玉, 方四寸二分,  
厚一寸八分, 交龙纽  
高二寸五分



金, 方三寸五分,  
厚一寸, 龟纽  
高二寸四分



金, 方三寸七分,  
厚一寸, 蹲龙纽  
高二寸七分

图六  
端康皇贵太妃之宝

图七  
恭慈康豫安成皇太后  
之宝

图八  
丽妃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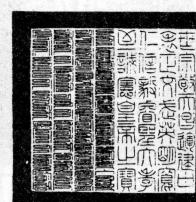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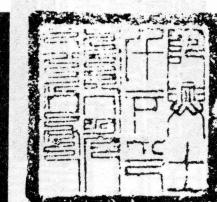
图九  
丽皇贵妃之宝

此外, 该宝还存在着严重的字体混乱情况。例如 ɿɿɿ 没有按照玉箸篆的左开放式收尾要求写成下垂的末笔, 而是篆为收敛型小篆的上包式; ɿɿɿ 的首音节没有按照满文篆字诸体开放起笔上覆的拼写要求将附加结构的点与上伸结构的拉辫覆之于开放起笔之下, 而是将点、辫与开放起笔并列成平顶式; ɿɿɿ 首辅音的附加圈在玉箸篆体中应当写成齐底式, 然而印中却被拦腰斩断, 等等。

于《故宫信片第五集清代宝玺》中所收“丽妃之印”(见图八)的“丽” ɿɿɿ yangsangga, 其第二音节字辅音 -s- 作为19号辅音下的非曲线结构字母, 被当作曲线结构字母处理而丢掉了上部的牙, 写成 ɿɿɿ, 对比同集内“丽皇贵妃之宝”(见图九)的同一字书作 ɿɿɿ, 后者的 -s- 才是正确的拼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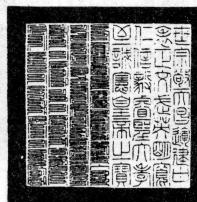
清代帝后去世, 从顺治二年(1645年)开始一依汉例颁发有谥宝, 帝后谥宝的规格也是非同寻常的。就是在清代的谥宝中, 满文篆字拼写错误也时有所见。

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方“仁宗受天兴运敷化绥猷崇文经武光裕孝恭勤俭端敏英哲睿皇帝之宝”(见图十。载《清史图典·嘉庆朝》), 其中所有的 ɿ ɿ t- 或 ɿ ɿ d- 统统被写成上部出头的阴性辅音 ɿ ɿ t- 或 ɿ ɿ d-, 如“猷” ɿɿ doro 被写成 ɿɿ duro, “绥” ɿɿ toktobuhu 被写成 ɿɿ toktobuhu, “端” ɿɿ tob 被写成 ɿɿ tub, “英” ɿɿ dacun 被写成 ɿɿ decun

(辽宁省博物馆所藏雍正谥宝“世宗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之宝”中也有这种情况出现，见图十一。载《辽海印信图录》)。此外，在曲线结构辅音与i元音相拼合的变形音节字中，该宝有些地方的处理不合于篆法。如“经”  algimbuha, 其于宝中写成 , -g- 与 -i- 拼合后的折移词线不见了，径直在辅音方化的右弧线下以短线连接下面音节字的辅音 -m-, 而且将 -i- 的下折垂线包含至底，右面并列的附加成分也变成了包含式；“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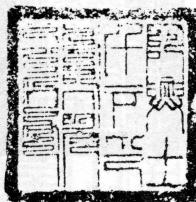
玉，长12.6厘米，  
宽12.7厘米，交龙纽，  
通高11.2厘米



青玉，长12.6厘米，  
宽12.6厘米，交龙纽



碧玉，长12.8厘米，  
宽12.8厘米，交龙纽，  
通高11.5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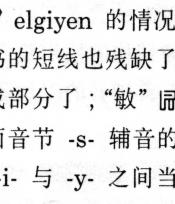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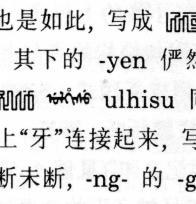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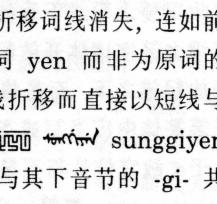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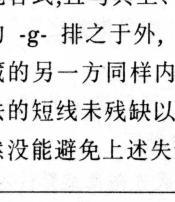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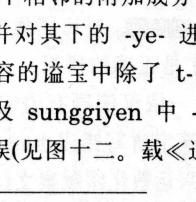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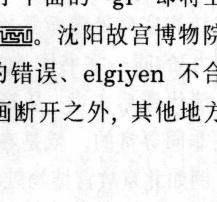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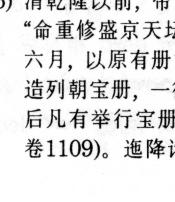
铜，方7.4厘米，  
厚1.8厘米，柱状纽

图十  
仁宗睿皇帝  
之宝

图十一  
世宗宪皇帝  
之宝

图十二  
仁宗睿皇帝  
之宝

图十三  
阿兴土千户印

 elgiyen 的情况也是如此，写成 , -gi- 与 -y- 间的折移词线消失，连如前直书的短线也残缺了，其下的 -yen 俨然为被包含的独立的词 yen 而非为原词的组成部分了；“敏”  ulhisu 同样，hi- 下未经词线折移而直接以短线与下面音节 -s- 辅音的上“牙”连接起来，写成 ; “睿”   sunggiyen 的 -i- 与 -y- 之间当断未断，-ng- 的 -g- 应以挪让法让位并与其下音节的 -gi- 共为包含式，且与其上、下相邻的附加成分并列，而宝中只包含了下面的 -gi- 却将上面的 -g- 排之于外，并对其下的 -ye- 进行复包含，写成 。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另一方同样内容的谥宝中除了 t- 或 d- 没有犯相同的错误、elgiyen 不合篆法的短线未残缺以及 sunggiyen 中 -i- 与 -y- 相连的笔画断开之外，其他地方依然没能避免上述失误(见图十二。载《辽海印信图录》)。<sup>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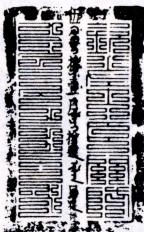
6) 清乾隆以前，帝后升祔太庙的尊谥玉册、玉宝仅藏一份于京师。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命重修盛京天坛、地坛，移建太庙于大清门东”(《清高宗实录》卷1065)。四十五年六月，以原有册宝次第镌造，其玉质、大小长短不能一律，特命有司俱以和阗良玉敬造列朝宝册，一律从同，以奉太庙，并将京师太庙换出者恭送盛京太庙尊藏。规定“嗣后凡有举行宝册事，皆以是为例，必为二分，一奉太庙，一送盛京”(《清高宗实录》卷1109)。迤降诸帝皆依制将先帝、后尊谥册宝另制复本恭送盛京太庙。《清宣宗实

类似这样的拼写失误与篆体混淆的情况在高等级的玺宝中尚且不免，一般官印中更可想而知。如：

乾隆二十三年六月铸制的“阿兴土千户印”(见图十三。载《文物》)，其中满文悬针篆“部族” aiman 尾音节首辅音 -m- 的麻辫被错位提高到元音后接 -i- 的两个长牙之间，写成 a'i(m)ika，麻辫既无牙可附丽，-i- 又被一分为二。



铜，长二寸八分，宽一寸九分，直纽



图十五  
钦差大臣关防



银，方三寸三分，厚九分，虎纽二台



银，方三寸二分，厚八分，虎纽二台

图十四

图十五

图十六

图十七

顺天府南路刑钱  
捕盗同知之关防

钦差大臣关防

镇守盛京等处将军印

管理三姓地方兵丁  
副都统印

嘉庆十七年十月铸制的“顺天府南路刑钱捕盗同知之关防”(见图十四。载《衡斋藏印》)中，“路” jugūn 的尾音节辅音多牙而被篆作 juga'ün，而且垂露篆独立的属格助词  都如玉箸篆体出头作 。

咸丰五年钤印的“钦差大臣关防”(见图十五。载《官印谱》)中，尚方大篆体“差” takūraha 的第二音节元音  -ü- 上部封闭结构的字肚  -o- 右边的封闭被打开，变成了  -a-，使这个音节变成了 -ka'i-；尾音节 -ha 没有写成尚方大篆的 ，反而将圈上行占位写成 ，尾元音 -a 右长撇的上卷不见了而成为小篆体，从而将此词篆成 。“大臣” amban 写成 、“关防”

录》卷9有这样的记载：“礼部奏准：仁宗睿皇帝、孝淑睿皇后升祔太庙，恭进玉册、玉宝，请旨另造一份，恭送盛京太庙尊藏。又加上孝敬宪皇后、孝圣宪皇后、高宗纯皇帝、孝贤纯皇后、孝仪纯皇后尊谥册宝，亦应于太庙各恭进一份。其玉册由京重造，玉宝照例在盛京敬谨改铸。所有原奉玉册五份，请派往之王大臣恭请回京，尊藏太庙。”《辽海印信图录》登载了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除宣宗成皇帝外自太祖至穆宗九朝帝后谥宝29方，其字体较原本粗犷，说明并非原样拷贝，而是有意区别的。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当后代皇帝加谥时，其谥宝是在盛京用原有的旧宝改铸，这与玉册从京城做好将旧册换回是不同的。

圖十八 **镇守 盛京等处将军印** kadalan 写成 **镇巡**，它们的右长撇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一般说来，乾隆时代因为是满文篆字完善的兴起时期，弘历皇帝具有较深厚的汉文化素养，对汉族传统书法艺术有较多的研究，对满文篆字极为关注，率先发起并亲自领导参与了满文篆字的改革完善工作，兼之盛世之时人才荟萃云聚，所以满文篆字完备之业不仅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辉煌成功，而且迅速将之全面应用于玺印之中。内阁大学士撰写的印稿要事先上呈皇帝御览训定后方交礼部如式镌铸，所以这个时期尽管因全国上下上万方官印的满文楷字都要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赶制改成篆字而创造了世界史上规模最大、数量最多、体式最丰、历时最长的制印“吉尼斯”记录，但在应用中出现的问题还不是很多，主要表现于个别字体的混淆方面。例如乾隆二十二年钤用之柳叶篆“镇守盛京等处将军印”(见图十六。载《官印谱》)独立的格助词 **i** 及结尾与曲线结构辅音 **-g-** 相拼的 **-i** 而成之 **gi** 分别写作 **𠂇** 及 **𠂇**，为钟鼎篆法之阑入(柳叶篆的写法应当是 **𠂇** 及 **𠂇**)，在三十三年的“管理三姓地方兵丁副都统印”(见图十七。载《官印谱》)则黏接在词中成为词尾形者正确，而独立的皆为钟鼎文体，这样混体的错误直到五十三年的钤本中才见更正过来，但在 **t-**、**d-** 的写法上却并非柳叶篆，还是受到了小篆的影响(见图十八。载《官印谱》)。



银，方三寸三分  
厚九分，虎纽二台



银，长三寸二分，  
宽二寸，直纽



银，长三寸二分，  
宽二寸，直纽

图十八 镇守  
盛京等处将军印

图十九 山东巡  
抚兼提督衔关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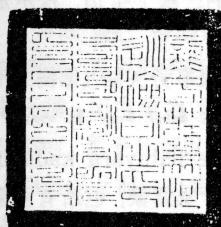
图二十 安徽巡  
抚兼提督衔关防

在笔者收集的部分乾隆时代官印中，属于这类混体的情况还有一些，兹不具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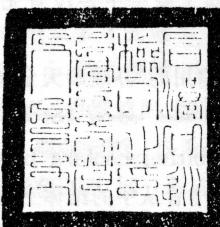
在满文篆字兴盛的乾隆时期，除了玺印中单词内部的拼写失误，还出现了印文中句子成分残缺的问题—即在一方印内，满汉文不能全部对译，一般是满文丢失部分信息。如：

乾隆四十九年钤印的小篆体“山东巡抚兼提督衔关防”中，满文只写成 **shandung ni giyarime dasara amban i kadalan**，译成汉语为“山东巡抚关防”，其中“兼提督衔” **ni giyarime dasara amban**

这样的内容于满文全然不见(见图十九。载《官印谱》)。对比同治五年钤印的“安徽巡抚兼提督衙门防”(见图二十。载《官印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后者的“徽” hui 篆作,上部的辅音 h- 下面的牙右部被封闭,使  变成 ,失去了下开放性词线,造成与下面同样失去下开放性词线的元音 -u- 之间的中断;“巡抚” giyarime 和合成词组的第二个字 dasara 中的首辅音 d- 因为出头而变成阴性,使 da- 变成了 de-,从而把这个字拼写成 desara。



铜，方一寸九分，  
厚四分，直纽



铜，方一寸九分，  
厚四分，直纽



铜，长9厘米，  
宽6厘米，直纽



铜，长9.2厘米，  
宽6.1厘米，直纽

图二十一

庞各庄兼  
河道巡检司之印

图二十二

石港口巡检司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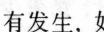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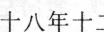
图二十三

顺天府北路  
刑钱捕盜同知之  
关防

图二十四 办理

奉天

全省文报事务  
关防

这样的失误在乾隆以后的岁月中仍有发生,如道光十八年十二月所铸垂露篆体“庞各庄兼河巡检司之印” pang ge juwang ni bira kamciha giyarimsi i doron 中,满文脱“司” sy(见图二十一。载《衡斋藏印》)—此可以对比乾隆十六年五月所铸“石港口巡检司之印”(见图二十二。载《衡斋藏印》)—。此印的正确写法当为 pang ge juwang ni bira kamciha giyarimsi i doron。此外,该印之“巡检”于尾音节辅音-s- 的顶部缺牙,写成 ,其正确篆法乃。

随着以后汉文化影响的加深,满语文逐渐退缩,其应用中的问题也日渐多了起来。到了面临没落的光绪时代,由于时局动荡、国运多舛,许多事务未能走上正轨,使得本来就极少有人认识的满文篆字之学习应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落。比及光绪中后期,开始出现纯汉文的官印,合璧官印满文篆字的篆法也不甚规范,讹误迭出,

后期字体的混用错乱更趋严重。比较起来，虽然乾隆以降各朝官印的满文篆字在拼写中错位、脱衍、混体、生造等谬误都不乏见，但是光绪时代满文篆字应用中的错误最多，仅笔者收集的有限钤本资料中就多达几十方，这里无法一一胪列，只选取有代表性者举析如次。

光绪三十年四月“顺天府北路刑钱捕盜同知之关防”(见图二十三。载《古玺印时代鉴别例证》)，垂露篆“钱”  caliyan 尾音节脱 -n 而被篆为  caliya；“关防”  kadalan 尾音节辅音 ɿ 之上伸附加笔划“拉辫”被错归于中音节 ɿ 上，而写成  kadlka。此外，印中所有的非词尾形附加圈点统统都写作底部出头者，这在满文篆字中是没有先例的，属于生造，殊不足取；格助词i出头皆如玉箸篆。

最为严重者，莫过于光绪三十二年启用的“办理奉天全省文报事务关防”(见图二十四。载《辽海印信图录》)，印内所用  abkai imiyangga gubci goloi bithei boolara baita be icihiyara kadalan 全部十个垂露篆风格(因为在该印中，尽管从字的结体上看属于垂露篆，但所有垂笔应当缀有标识者都失落露珠)的满文词，无一篆写正确。其中，“天(的)”  的尾音节丢失 -k- 的两个牙而写成  aba'i。“奉”  的写法更离谱了：首音节 i- 多出个似牙又似玉箸篆 -r- 的东西，使这个音节变得无法识别；第二个音节 -miyang- 首辅音 -m- 的“麻辫”被错移到牙下，其下面的 -i- 被去掉了下垂的折笔反移至于牙上，下面的 -y- 被写成尚方大篆体的 -c-，而其下的 -ang- 更是面目皆非：-a- 下面的 -n- 牙丢掉了，-g- 却被写成了词尾形的 -i-；尾音节 -ga 也很特别，19号辅音下的牙结构本来应该省却上开放词线直接与 -g- 的横折末笔的连接点相接出牙，而印中却以曲线结构与 -i- 相拼情况下词线折移的形式从靠近左边线的左2线下来折移至右2线，再向左出二牙，结果少了一牙，整个词写成 。“全”  首音节 gu- 的下开放词线不是从下部距右边线2间远处的右1线伸出，而是从1间远的右2线向边线斜下撇出，这样一来，与音节末的收声辅音 -b- 就无法正常相接，此一误；紧接着下面又多出一个牙来，使首音节变成了 guba-，此二误；尾音节的辅音 -c- 被错写成 -j-，应当回收从右2线与尾元音直接连接的词线却毫无道理地进行左折移从距左边线1间远的左2线实现衔接，此三误—以此将该字拼写成 。“省(的)”  问题出在尾音节，于 -o- 元音下本应该直接以下开放词线与黏和的格助词 -i 相接，而印中却画蛇添足增出一个牙，使尾音节变成了 -lon'i，从而把这个字写成 。“文(的)”  于印中写作 ，首音节 b- 下衍出一牙，变成 ba'it；尾音节 -h- 作为曲线结构辅音，首笔应当另起成开放式，而斯印未如是，乃竟然于闭音节辅音 -t- 之末笔上不加词线直接联结，造成 -t- 后面的牙与 -h- 的混同，使人茫然如置身于五里云雾之中，难于识辨，更加之元音 -e- 的牙残缺

了，牙的下角没有右折的回笔而变成与词尾形元音 -i 在左2线相接的词线，而其下于右2线出向左折移词线(与 𩫑𩫑 的情况类似)，复接词尾黏和格助词 -i。“报” 𩫑𩫑 在印中书作 𩫑𩫑，首音节复元音中后面的 -o- 被移位到下个音节中去，而将中音节 -l- 的牙置换到这里，使 boo- 变成了 bon-；这样一来，影响到中音节， -la- 成了无牙的 -l- 与 -on- 的组合；尾音节的辅音 -r- 因折笔处少了向上的短笔而变成了 -i-，元音 -a- 的下面衍出了一个玉箸篆体词尾形的 -r，使 -ra 变成了 -inr。“事务” 𩫑𩫑 在印中拼作 𩫑𩫑，首音节 bai- 中 -a- 元音后面的 -i- 根据拼写法应该是两个 -i-，后面的一个与 𩫑𩫑 中的情况一样，被去掉了向下的垂笔，其下面多出了一个牙，变成了 bain-；尾音节 -ta- 后面也增出一个牙，成了 -tan。“把” 𩫑 被写成 𩫑，格助词 be 缺点多牙变成了 ban。“办理” 𩫑𩫑 在印中被写成 𩫑𩫑𩫑，首音节字冠下增牙， i- 的后面增 -i-，变成 ai-；第二个音节 -ci- (由于印样不清，印中原为 𩫑𩫑𩫑，根据前面 𩫑𩫑 中 -c- 的写法，笔者将其复原为 𩫑𩫑𩫑，似乎还可以复原为 𩫑𩫑𩫑，成为玉箸篆体的写法，但这样一来就与本字下面的以及前边已出现的 𩫑𩫑 同一形式 -iya- 中 -y- 的写法混同了，所以笔者还是倾向于前者)的辅音，错写成 -j-；下面元音 -i- 被移位至其上(也可以把上面的 -i- 视为衍出，而下面 -i- 的垂笔打了弯，其下开放性词线不见，类乎被处理成曲线结构辅音与 -i- 相拼的模式移到前面去了)。第三个音节 -hiya- 作为曲线结构辅音首笔所犯的错误，一似 𩫑𩫑，但这里已不是曲线结构辅音 -h- 与 -i- 相拼的省略变形，而是一上一下多出两个牙成为 -he'in 的形式了；下面的 -y- 如前所见被篆作玉箸篆体的 -c-，而 -a- 脱。“关防” 𩫑𩫑 是普通印信中常见的一个通名，按说不应该出错了，但也还是被蹩脚地篆成 𩫑𩫑，首音节 ka- 被增点写成 ga-；中音节因尾音节的拉辫错位升高而使 -da- 书成 -(l)ta-；尾音节因中音节下的 -l- 辅音拉辫的错位，剩下了三个牙， -lan 变成了 -ka。综观此个案十篆十错的典型，足以说明满文篆字应用之脱衍、错位、混体、生造等混乱现象于光绪末年实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虽然如此，清代普通官印多达上万方，满文篆字偶有失误不足为奇。而皇帝传用之国宝重器毕竟只有二十一方(清代传国玺共二十五方，其中有四方系太宗以来“先代相承传为世守”而非乾隆时代改铸具有合璧满汉玉箸篆字者)，如此高规格的御宝之中也出现满文篆字拼写法上的失误，就不能不是一桩大失皇家脸面与政体尊严的严重事件了。令人费解的是，这方拼写错误的帝玺竟然能得蒙混过关，在“以展宗盟”的诏书上堂而皇之的钤印面世，诚可谓玺印史上罕见之一大奇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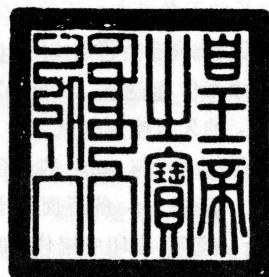
此外，还有一方檀香木质的“𩫑 𩫑 (han i boobai) 皇帝之宝”(见图二十五。载《明清帝后宝玺》，“皇帝”满文 𩫑 之玉箸篆应当写作 𩫑，印中却书成 𩫑，收声辅音 -n 的尾部本来应当写作收敛型的 𩫑，却被书成开放式的 𩫑。

在满文篆字三十二体中，属于开放型篆字的 -n 虽然尾部垂直折下，但转折点却是在右边线上，例如悬针篆的 ᠨᡳᠮᠠᠨ aiman 写作 ᠨᡳ、垂露篆的 ᠕ᡳᠳ᠈ᠯᠠᠨ kadalan 书成 ᠨᡳ。除此之外，尚无似此形式从中下垂者，只是坟书因尾部要向外斜出而推动折点内收，从而写成 ᠨᡳ，如 ᠨᡳᠯᠠᠨ ilan，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尾部的斜画造成的，况且其在同样的情况下附加成分圈与主体笔画尾部不同此印作并列式而作下承式一圈不下垂至底而为主体笔画尾部所承托，即 ᠨᡳᡥᠠᠨ han。因此，这个字不属于异体阑入之混体，亦应判为讹误。分析所以如此，合乎道理的解释只能是：玺中将字尾写成与下面属格助词连写的形式(由于连写，词尾形的 ᠨᡳ 势必由封闭式改而为开放式，因为词

尾形的 -i 书作 ᠨᡳ，上开放性词线位于右2线，以故推动其上已变成词中形之 ᠨᡳ 的下开放性词线内移至右2线成为 ᠨᡳ 以便与 ᠨᡳ 同线相接，从而成为玺中现在的样子。类似的例子如 ᠨᡳᡩᡳ “天之”中的 ᠨᡳ 便如此，例中的 ᠨᡳ 虽然系以 -a 结尾，但在满文中词尾乃至词中闭音节收声辅音 -n 及 -n- 与 -a 及 -a- 的书写形式是完全相同的)，但由于事实上并没有连写，所以上面的 ᠨᡳ 便错误地成为开放形词尾，辅音的附加圈也相应变成词尾形，而其下面的 i 却并没有写成开放形的 ᠨᡳ 却书作独立形的 ᠨᡳ。是故这一属于字母不同位置间的“错位”(满文除了元音有独立形之外，字母一般有词头、词中和词尾等形式，处于不同位置的字母书写时在形体上有所差异)也是满文拼写法中所不允许的疵弊。

清代对满文书写的要求十分严格，在郑重场合尤其如此。《清实录》有以下记载：

嘉庆四年七月辛巳，又谕：“本日内务府大臣呈递清字折片内，于恭书孝圣宪皇后尊号缮写错误，其咎甚大，非寻常讹错可比，因命军机大臣传旨严询。除怡亲王永璂现在患病，永来系在圆明园，所递之折未经阅看外，布彦达赉、缊布、阿明阿三人自认错误，均请革职交刑部治罪，实属罪所应得。惟念布彦达赉管项繁多，一时未能兼顾；阿明阿初管事务，向来不识清文，朕所素知，二人情有可原。著革去总管内务府大臣，仍交军机大臣议处具奏。至缊布久管内务府，竟系福薄灾生，有心试朕留心事务否。著革去总管内务府大臣并工部侍郎、正蓝旗满洲副都统，赏给四品顶带，拔去花翎，仍交军机大臣严加议处具奏。一任缊布市恩邀誉，朕亦不惧。姑念伊于造办处事务尚为熟悉，著加恩留其佐领，在造办处司员上行走，以观后效。其管理造办处俟朕另行简用。缊布不得以曾任大员自居，亦不得心有推委，遇事知而不言，致干重



檀香木，方四寸八分，  
厚一寸一分，交龙纽  
高一寸二分

图二十五 皇帝之宝

戾。所有承办奏折之主事德宁，缮写之笔帖式兴保，俱著交刑部治罪。

又谕：阿明阿因内务府奏折错误，已降旨革去内务府大臣，但念伊向来不识清文，管理内务府未久，诸事本末谙练。著加恩赏给头等侍卫，仍戴花翎，随同永来学习管理圆明园事务。朕非因阿明阿系藩邸随侍之人，同罪异罚也。”<sup>7)</sup>

甲申，又谕：“三法司奏将内务府呈递奏折书写错误之主事德宁，笔帖式积善、兴保按律分别定拟斩一折，此次内务府奏折恭书孝圣宪皇后尊号缮写错误，其罪甚大，该承办之主事、笔帖式等官律以大不敬之条，实属罪无可宽，自应依律办理。惟是朕在藩邸时，向知内务府掌仪司承办祭告典礼，于列后尊号中惟孝贤纯皇后尊号当时敬谨缮写。此次竟系顺笔致误，且内务府人员于清文本不熟习，至如缮写清文则多有依样描画，不但不解文义，且并不识字面者有之。即汉人中亦有能写不能识者，况此案总管内务府大臣等已皆分别从轻示惩未加深究，则此等微员于万无可宥之中亦不得不求其一线生路，量从末减。所有承办之主事德宁，写底本之笔帖式积善，均著加恩免死，各枷号一个月，满日鞭责八十发落。笔帖式兴保，年仅十七，系照本眷缮，或竟不识清字，业经革职。著从宽鞭责五十，即行发落。”<sup>8)</sup>

从中可以看出内务府大臣的奏折中，只因孝圣宪皇后尊号满文缮写的一处失误，相关责任人尚要被以“大不敬”罪处以“斩决”，那么作为皇权象征与礼仪重器且时有所用的皇帝传国御玺，其庄重地位与皇后尊号之缮写自然无法相提并论。所以在皇帝御宝中出现前揭满文篆字拼写失误的问题，无论怎么说也都令人难以接受。

在中国文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满族文字及其篆字于有清一代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满族语言濒临灭亡、满族文字成为死文字的今天，对满族文字特别是满文篆字进行全面研究，是满族文化整体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对满文篆字不注意加以研究、清理，那么起码在文字学领域势必还是处于茫然无知、笼统模糊的认识状态中。对此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不闻不问，甚至以为没什么可研究的，则不仅是对满文篆字的无知，也是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不负责任。

满语作为濒临消失的语言，目前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作为记录满语载体之满文及其拼写法的研究，一直是满语文研究的薄弱环节。对于满文篆字，向少问津者，尤乏科学、深入、具体研究之力作。而对于满文篆字在玺印应用中存在问题的研究，更可谓前不见“古人”。因此，本文是目前国内唯一涉此一方面的拓荒之作，其所揭示出来的满文篆字玺印中之诸多失误，对于具体了解满文篆字在有清一代使用中究竟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存在哪些问题，无疑具有裨益和重要的启迪、认识价值。

希冀此文的发表在中国民族古文字及世界性满语文研究领域能略放些许异彩，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7) 见《清仁宗实录》卷49。

8) 见《清仁宗实录》卷49。

## 参考文献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90), 《满文老档》, 北京: 中华书局。  
 图海等(1985), 《清太宗实录》(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庆桂等(1986), 《清高宗实录》(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文庆等(1986), 《清宣宗实录》(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曹振镛等(1986), 《清仁宗实录》(影印本), 北京: 中华书局。  
 赵尔巽等(1986), 《清史稿》, (《二十五史》缩印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  
 金毅、齐雅香(1992), 《不断完善 广泛应用—清代满文篆字应用情况的再调研(上)》, 《满语研究》 1999(2): 77-79, 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  
 金毅、张鹏(2000), 《不断完善 广泛应用—清代满文篆字应用情况的再调研(下)》, 《满语研究》 2000(2): 34-46, 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  
 黄锡惠(1998), 《满文小篆研究(上)》, 《满语研究》 1998(2): 41-58, 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  
 博仪(1964), 《我的前半生》, 北京: 群众出版社。  
 王绵厚、郭守信(主编)(2000), 《辽海印信图录》, 沈阳: 辽海出版社。  
 徐启宪、李文善(主编)(1996), 《明清帝后宝玺》,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朱诚如(主编)(2002), 《清史图典》,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黄伯川(辑)(1935), 《衡斋藏印》(套色影印本), 北京。  
 夏廷安(1996), 《云南永善县发现清土司印》, 《文物》 1996(1): 93, 文物出版社。  
  
 罗福颐, 《古玺印时代鉴别例证》(复印本), 北京: 故宫博物院。  
 《交泰殿宝谱》, 北京: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 1929。  
 《官印谱》,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  
 《故宫信片第五集清代宝玺》, 北京: 故宫博物院, 1982。

HUANG Xihui  
 23-321, 72 Qing Bin Road  
 Nangang District  
 Harbin, 150080 CHINA  
 <hxh7235@sina.com>

Received 18 March 2005;  
 accepted 23 April 2005.